

《主體、心靈、與自我的重構》書評

蔡怡佳 Yi-jia Tsai

天主教輔仁大學宗教學系所教授

本書是「新世紀的社會與文化」系列叢書的第七冊，從心理學與人類學的角度來探討主體、心靈與自我重構等議題。本書導論的作者，也是全書的主編黃應貴首先提出對於現代知識的反省，以及現代性的知識下對於人的看法。情感與情緒在西方啟蒙理性的知識傳統中被排除於科學之外；宗教性也被限縮於私領域，或是神學領域，被認為不是科學研究的對象。在現代性知識的背景中，「個人主義」的意識型態強調人的自主性與理性，這又與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的政治經濟條件有關。（頁 3）現代性知識對於非理性以及宗教性的排除，構成本書的重要背景。本書的各篇論文可以視為對此知識處境的回應，在主題的選擇上，探討前述被忽略的主題；在知識論與方法論的層次上，也企圖呈現對於非理性、情感、與宗教經驗之探究的可能性。

黃應貴以其對於柬埔寨布農族的研究為例，指出傳統社會中透過生命禮儀所呈現的不同層次的人觀，以及心靈的性質如何隨著時代歷史與社會條件的變遷而改變。布農族所經歷的政治國家化、經濟市場化，以及基督宗教化等所打造的公民人觀、經濟人觀、基督教人觀，在不同社會生活領域發揮作用。（頁 23）傳統的人觀與這些變化揉雜，自我認同的碎裂狀態使得「我是誰？」成為嚴峻的課題。在這個背景之下，主體問題於是成為關鍵議題。黃應貴進一步分析新自由主義化下的主體狀態，如何在網際網路、交通與溝通工具的快速發展、消費主義的主宰、物與商品對自我認同的形塑，以及當代金融制度中，形成破碎與多重的人觀與自我，以及「社會順服的欠債者」。自我在多重、破碎狀態下所面臨的重構課題，透過關係性存有來重新建立，包括人與人、人與物，以及人與「超自然」或「宗教」的關係。（頁 36）在這些關係中，人與宗教的關係又最被忽略。黃應貴指出：「在現代性知識觀的主宰下，大部分經驗論理性觀點其實依然迴避了宗教信仰者對於心靈乃至於靈魂的看法，以及此種看法對於人類行為與思想的深刻影響」。（頁 10）本書中的論文或多或少均觸及個體對心靈與靈魂的看法，也可以視為對此種忽略的重要補充。

本書前三篇論文的作者都是具有現象學心理學背景的臨床心理學者，第一章的作

者翁士恆以客體關係的理論為基礎，提出對於「原初倫理」的探討。「原初倫理」是人與第一個客體的關係，是自我「將成卻未成」之際，也是人我兩分之理性尚未成形的狀態。本文企圖以「原初倫理」來為被理性所界定（排拒）的「瘋狂」與「障礙」還原至「尚未兩分」的過渡狀態，企圖擱置病理學理解中對於正常與不正常的區分。從病理學的診斷論述到「未完成自我」的理解，為被指認為症狀之「無法言說的經驗」從病理化的論述移置到發展中的原始經驗，此時的課題就成了「如何涵容與蘊養從『尚未兩分』走向『人我兩分』的途徑與疏通之途」，而不會「以診斷與病理化約與隔離我們所以為的『異常』。」（頁 74）客體關係認為情感的支持與護持（holding）使得混沌中的破碎經驗得以形成方向，促成人與人的連結，而使得療癒與復原成為可能。這是以倫理關係為基礎的自我開展。原初倫理的照顧關係是在先於語言的、豐富的身體經驗中開展，因此，非語言的介入，例如膚觸、運動的身體感、薰香、柔適空間的創造，都成為「未成形」經驗的基礎。（頁 90）本文對於醫療化的主體與自我認識提出重要反思，讓「專業倫理」回返「原初倫理」的基礎，這也意味著讓理性自我回到先於理性的倫理關係之中，重新讓理性自我的開展更為豐富與流動。

延續前章對於倫理的關注，本書第二章的作者彭榮邦反思大體捐贈中明顯的、以及被遮蔽的倫理關係。本章首先指出大體在生前的「擁有者」與解剖課程的醫學系學生之間的倫理關係。目前所常用的「大體老師」或是「無語良師」並不是原來就有的稱謂，最初提供解剖課程學習的來源主要是不知名的屍體，或是死刑犯。這些無名或是被判定不值得活下去的大體，以「無面容身體」的樣態存在，召喚出一種鬼魂的想像。（頁 102）解剖課程的學生是在畏懼的情感中以祭拜的儀式來對這短暫的交會表達對死者的「敬意」。之後，在大體捐贈的宣導中，提供解剖課程使用的變成有名有姓的「贈予者」，以賦有宗教意涵的犧牲奉獻精神成為「良師」。彭榮邦指出，作為「受贈者」的學生因此而置身於「屬於人的、蘊含著歸還義務的關係向度」之中。（頁 104）本章進一步討論在捐贈過程中所涉及的多重身體，包括捐贈者活著時「我自己的身體」、家屬為死者進行儀式處理的「遺體」（關係性身體），以及作為解剖教學使用的「大體」（生物性身體）。多重身體的討論是企圖提出被「醫療」與「法律」所遮蔽的，身體在生活經驗上的多重性。（頁 110）死亡因此不只是醫療所判定的生物性死亡，或是法律上所認定之社會身分的消亡。親人為死者透過儀式所安置的是另一種關係的形式，雖然面容無法相見，但「轉化為一種內在的、象徵性的關聯」。（頁 110）這樣的關聯經常建立於宗教或是超越有關的宇宙觀與象徵之中。本章最後也指出在大體捐贈的流程中，被忽略的另一個犧牲者，也就是家屬的難捨之情。對死者來說，生物性的死亡其實是

生者經歷「死亡」現象的開始。這個被死亡所撕裂開來的「異樣的身體」必須在之前所指出的多重身體的各個向度中被回應與處理。（頁 111）本文對於多重身體所開展出之不同主體樣態，以及倫理關係有精采的討論。和第一章都共同指出主體建立過程中身體性的重要。

第三章的作者李維倫以「家庭人」的主體狀態來討論華人家庭主義中世代關係的衝突困境。本章以「謀生」這具有現象學意涵的概念來取代過去「經濟人」與「政治人」的觀點，企圖更貼近個人的日常行動與人際關係。（頁 144）李維倫從德國現象學家黑爾德（Klaus Held）對於「度日時間」與「世代時間」之經驗的區別為基礎來尋找困境的解決。「度日時間」是日常生活中最直接的時間經驗，人們在其中日復一日面對生命所需。除此之外的另一個時間經驗則是經驗新世代的出生以及舊世代的老去的「世代時間」。「度日時間」對生命所需的關切使得家庭中的人與人的關係被工具化，長輩對後輩、男性對女性的支配也更容易得到關係結構的支持。李維倫指出：「要超越每日生命所需之時間性的網綁，就要讓人願意將自己歸屬於歷史世代長河中的一個環節，讓世代時間經驗顯化。這也是要人認識到自己是生死之人，……。」（頁 147）在納入對自己必死性的認識之中，李維倫提出「照顧」作為世代彼此之愛的理解框架，而主體的自由也是在這樣的照顧與被照顧的相互之愛中得到實現。本章的最後提出「家庭個人主義」，並對馬斯洛的需求理論提出批判，提出其需求階層理論只呈現了一半的個人發展，忽略了老年之生命發展的需求。生命發展的完整循環實包含了從被照顧者→照顧者→被照顧者的歷程。（頁 160）本章所探討之家庭人的主體性可以說是個體最切身的樣態，與首章的「原初倫理」與第二章的「宿緣關係」都共同指向自我建造過程中最接近自我的層次。「新世紀的社會與文化」系列叢書的首冊所探討的主題就是「家」，本書的前三篇論文也可以視為對此主題所提供的現象學進路的回應。

本書最後兩章的作者是長期進行宗教人類學的學者，兩篇論文都以女性為對象，也都對其生命經驗與宗教經驗的交織提出深入的分析。第四章的作者陳怡君以其長期投入研究的屏東萬金天主教之四旬期儀式為背景，討論「受苦自我」與宗教實踐的互相架接。四旬期的儀式是萬金天主堂幾個主要儀式中最具排他性，最晚對外開放的儀式，以受苦的耶穌為關鍵象徵，以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苦像與拜苦路作為儀式實踐最重要的物質文化形式。（頁 175）本章針對教友在儀式中的身體感官經驗與情感經驗進行了具體而生動的勾勒，並探究此儀式如何為當地天主教徒架設起受苦情緒感受的具體情境，並提供教友理解受苦的語彙與釋放痛苦的出口。（頁 166）這種儀式藉著具

體的物質形式與教友的受苦自我互相映照的現象，除了個人的體驗，還包括在群體中「共苦」的經驗。然而，隨著外在結構性力量的介入，四旬期儀式也經歷快速的變化，以消費與展演的方式從對於受苦與節制的強調轉向自我欲望的滿足與表達。四旬期儀式於是從形式化，規範性的拜苦路儀式來安置個人的受苦經驗與情緒，轉向越來越個人化、日常化的方式來紓解與滿足內在的心理需求。(頁 167)在朝向個人化的變化中，陳怡君以三個不同世代的女性教友為對象，討論個人如何為象徵與儀式重新賦予意義，並發展出個人化的儀式來面對與處理生命中的苦痛。作者以親密、細膩的書寫呈現了這三位出生於五零，六零與八零年代的女性，如何以馬槽布置、編織等手工創作與物件來表達自我內在的渴望與嚮往，以及如何在受苦中創造出新的自我與主體性。(頁 166) 這章將「受苦自我」放置在多重脈絡中精采地呈現，兼具了民族誌的深度以及個人體驗的深入書寫。

第五章的作者呂玫媛以一位由靈乩轉為擔任王爺乩身的女性修行者慧命師姐為對象，討論其多重的跨界經驗，包括社經地位的跨越（從醫療專業到宗教靈媒）、靈媒範疇的跨越（從靈乩到乩童），以及性別的跨越（女性靈媒作為男神童乩）。這些跨越充滿掙扎與挑戰，前兩者隱含一種違反社會期待的「向下流動」，以女身擔任男神的乩童也顛覆了地方社群的期待。在這些張力之中，慧命師姐依憑著三股動力前進，首先是她與神明（母娘）的親近，以及她對於神明指示的順從，再來是她對於夫家之家族的照顧之情，最後是她透過修行（讀經）而對靈動與通靈所得到的新的理解。她的自我掙扎在這些與神明、與家族、與自我的關係中得到調整與解決，除此之外，她也為靈媒透過神明為信徒所提供的濟世服務增添了不同的風貌。她的醫療背景為信徒提供除了神明指引之外的現代醫學知識的專業協助、她對於靈修與讀經的投入為王爺信仰帶入靈性修行的觀點，她的女性身分與身體也為原本嚴厲陽剛的王爺增添了柔性溫和的氣質。呂玫媛指出：「師姐所呈現的反傳統的童乩儀式、反教條化的王爺形象，以及在傳統王爺信仰中宣達靈性修行觀點，代表的是社會變遷下宮廟制度的改革契機。就此而言，她將靈性修行的理想與價值帶入靈媒服務中，以靈修提昇自我並以此重塑童乩的理想形象，不僅體現了靈山神學體系的靈性運動，新時代的靈性觀也已然浮現其中。」(頁 284) 本章以親密、細膩的書寫方式呈現一位突破傳統之女性修行人的複雜路徑，也為其多重的自我的創造提供了深入而精闢的分析。

本書結合現象心理學取向之臨床心理學者以及宗教人類學者，對新自由主義條件下自我的破碎、以及自我的探尋的議題由不同的現象提出了深刻的分析。三位心理學

者的文章環繞著對於倫理的關注，回應導論中個人作為關係性存有的核心議題提出討論。兩位人類學家對於人與宗教之神聖對象，以及宗教象徵所提供的超越性連結則有細膩的呈現與分析，也回應了導論中所指出的，在被現代性影響的知識建構中，對於人與神聖或超越之連結經驗的忽略。在說明本體論轉向的浮現脈絡以及主體問題在當代的重要性時，黃應貴指出：「人與超自然的互動，由於直接挑戰了既有的現代性知識，而不易被認識，也不易深入瞭解。這條路徑，不再承認現實的意識是人存在的唯一意識世界，更不將世界具體固定化於限定的空間，反而強調人可依其個人生命經驗的領悟或修行，達到更高、更廣、更深的視野與格局，使當代狹隘的主體化問題轉換為達到更高整全性自我追求的境界，包含認識世界的方式與面對未知知識的昇華。」（頁 57）這段話也可以視為這本難得而精采之學術著作的註腳：在未知知識的邊際探尋對於人類文化、社會與心靈的嶄新理解。

